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何方昱 著

训导与抗衡： 党派、学人与浙江大学（1936—1949）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上海市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何方昱 著

训导与抗衡： 党派、学人与浙江大学（1936—1949）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训导与抗衡：党派、学人与浙江大学：1936—1949/
何方昱著.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7
ISBN 978 - 7 - 5458 - 1496 - 5

I. ① 训… II. ① 何… III. ① 国民党党化教育—研究
— 1936 - 1949 IV. ① 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47048 号

责任编辑 沈佳茹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夏 芳

训导与抗衡：党派、学人与浙江大学(1936—1949)

何方昱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mm 1/16
印 张 19.75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458 - 1496 - 5/D.56
定 价 58.00 元

序

姜义华

何方昱的新著《训导与抗衡：党派、学人与浙江大学（1936—1949）》即将出版，她将全文用邮件发了过来，强令我给写个序。

何方昱的这项研究，以浙江大学这一个案入手，从训导制在大学的实施，到国民党党团体系在大学的确立，最后到国民党党化教育在大陆的最终溃崩，分析了这期间政党派系、学人以及学生为争夺权力及政治合法性如何彼此角逐，由学人的政治认同考察民国政治文化的转变。为弥补学术界研究这一方面的阙漏，作者通过浙江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贵州省遵义县档案馆、贵州省档案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台北国民党党史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馆藏大量原始档案及其他相关文献，展现了浙大创建训导处、遴选训导长的过程，探究了地方党部对大学校园的倾轧状况，厘清了国民党、三青团在浙大的组织形态与具体运作过程。作者又以完整而丰富的《浙江大学日刊》《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竺可桢全集》《陈布雷日记》《王世杰日记》等为主，结合彼时浙大学人著述（包括著作、时论、书信及日记等）的文本解读，说明了学生自治会（学生群体）在日常生活与政治事件中如何活动，学人与政党派系在大学场域中如何互相角

逐，探究了学人的思想世界与心理状态，以及他们在政权更替时的政党认同、身份转换以及政治抉择中为何作出不一样的选择。这些内容在绪论中已经有了清楚的表述，也充分表现了作者善于在原始档案文献中精心仔细进行梳理的治史风格，所有这些都完全不需要我另作介绍。

但是，读了这部著作后，想得最多的倒是近代以来中国大学发展问题。近代中国的大学和大学制度，是在国家、社会、西方传教士和西方国家、中国知识人这些力量的努力下一一创办起来的。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中国上海创办的圣约翰书院，是近代中国第一座高等教育学府。京师大学堂由清廷创立于1898年，目的是教授“西文西艺”。浙江大学前身求是书院、武汉大学前身自强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天津北洋西学学堂、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四川大学前身四川中西学堂，则是由清廷各地督抚创办的近代新式高等学校。1905年创办的复旦公学，是第一所由国人通过民间集资而自主创办的高等学校。1911年命名的清华学堂，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堂，是为中国政府派送留学生到美国接受系统教育而建立，目标是为中国培养新型领袖人才。这些大学创办的背景不同，所确定的大学目标和使命便有所差异，大学运营和管理制度也各有特点。

中国并非没有进行大学教育的历史传统。胡适、冯友兰等人便认为北京大学是中国历代“太学”的正式继承者。但是，这些新式高等学校，确乎因应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建立，培育能够满足实务需求的应用型人才，便常常成为许多学校最为紧迫的追求，知识的灌输与传播也因此常常压倒中国传统大学教育所一贯最重视的立德树人，成为大学发展的第一要务。将创办学校作为牟利手段或攫取权力的工具者，也经常会掺入其间。

本书所研究的浙江大学，是近代中国一座很有代表性也很有影响的大学。浙江大学这段历史，很有说服力地表明，应当树立什么样的大学精神，才能够真正将各种不同的力量聚集起来，彼此信任，在最艰难的环境下也能努力拼搏，让大学充满活力，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学府。而一旦在大学精神上产生了歧义，让对权力和利益的追逐在大学管理和大学运行中占据上风，那么，信任就会丧失，团队就将瓦解，人才就会流失，冲突就会不断，学校发展就会出现重大波折。

《礼记·大学》开宗明义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里的大学，就是指实施高等教育，对受教育者进行深造。这里的道，就是指使命、本质、精神、路径。明明德，就是指大学不仅仅注重知识的传授与扩展，更注重追求理想、崇尚道德人格的塑造，注重真诚地崇尚学术、勇于探索、敢于也善于探寻真理的治学精神的培养，这就是不仅关注知识的传授，更注重的是教导学人怎么做人以及怎么去做学问。亲民，则是要求大学中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做人做学问，都不是为一己之私，而是真正矢志不渝地为了民众，这就要真诚地亲近民众，了解民众疾苦，以百姓之心为心。至善的境界，在《大学》中，指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可视作《老子》中所说的居善地、心善渊、予善天、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等等。这一大学之道，显然也适用于近现代的大学建设。无论是国家或政党，还是民间社会，无论是校长、教授，还是广大学生，凡是践行这一大学之道的，便必然成为大学健康发展的动力乃至主力、中坚；凡是背离这一大学之道的，便不免会成为大学健康发展的阻力、破坏力。近代以来中国大学发展的整个历史，都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本书所复原的浙江大学的这段历史，其价值恐怕也正在于此。

拥有一大批为了国家、为了人民、为了人类而敢于追求真理与光明、勇于捍卫真理与光明的教师和学生，大学就能够永葆最强大的生命力。

目 录

序	姜义华 1
绪论	1
一 学术史梳理	1
二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7
三 资料说明	12
第一章 国家权力的介入与导师制的兴衰	17
一 战前“军训强而训育弱”之窘境	18
二 郭任远管理浙大的失败	21
三 训育委员会与竺可桢首创导师制	29
四 导师制的困局	38
小结	43
第二章 训导处的成立与训导长身份认同危机	46
一 训导处的设置	47
二 训导长的遴选	50
三 为“党国负责”的首任训导长姜琦	54
四 “为学生请命”的训导长费巩	60

小结	71
第三章 国立大学与国民党地方党部的颉颃	74
一 浙大内迁及其与贵州地方党部的抵牾	75
二 “倒孔运动”中浙大与湄潭县党部矛盾再起	89
三 蒋介石下达手令与黔特会拘捕学生	98
四 重组训导处与浙大区党部的建立	108
小结	119
第四章 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大学校园中的党派之争	123
一 三青团浙大直属分团部的筹建	124
二 遵义游行中的三青团与马列主义小组	130
三 “面粉事件”与“费巩案”	138
四 夏令营与话剧团：三青团的运作模式	149
小结	155
第五章 学生自治会与训导处的抗衡	157
一 《生活壁报》的创办与“训”、“导”失效	158
二 壁报危机与《学生壁报审查办法》的颁行	160
三 “两种权力存在于学校”与战后壁报风潮	170
四 战后训导长与训导处的维系	176
小结	197
第六章 知识、权力与浙大史地学系的合分	200
一 南高渊源与竺张合力	201
二 课程设置与通才教育	213

三 权力重组与史地分离	219
小结	225
 第七章 鼎革之际的抉择：张其昀学术生涯的政治转型	228
一、地理知识与人脉初结	229
二、加入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初涉政界的顿挫	234
三、“为学问而努力”与地略学研究	240
四、“驱张运动”与渐趋政治中枢	248
小结	256
 第八章 训导制下的学人政治认同危机：去留之间的竺可桢	259
一 被迫入党与认同危机的产生	260
二 几次辞职与不堪重负	264
三 军警特务系统与学人的政治抉择	269
小结	276
 结语	278
 征引文献	285
 后记	301

绪 论

训导制既是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为加强对大学的控制而实施的一项关键措施,又是民国时期广义的党化教育的重要环节。该制度的无效和失序成为民国政治文化转变的一个缩影,昭示了国民党组织形态在民国末年的混乱与无序,也是其政权走向败殁的又一显例。以训导制为切入点,考察政党派系在大学校园中的权力斗争,以及由此引发的学生抗衡运动与学人政治认同危机,实乃民国史研究中的重要议题。

一 学术史梳理

以往学界对于战时中国政治、大学与学人的研究,多聚焦于西南联大、自由派学人与倾向激进的学人。不仅鲜有从训导的角度研究三者的关系,且将浙江大学视为理所当然的“民主堡垒”,于有意与无意中遮蔽了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向。那些保持中立抑或与当局较为亲近的学人也因此在一般的历史书写中成为“失语者”与“失踪者”,乃民国史研究的阙略。学界对于训导制这一议题虽有论及,然已有成果多从宏观着手,或做整体性研究,或从教育学视角出发,鲜有围绕大学进行个案专题研究。

就本项研究所涉及的领域，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五类：

第一，训育、学潮与政治的研究。国内外学界关于学潮的既存研究，多聚焦于辛亥、五四、抗战之前及战后四个时期。^{〔1〕}最近二十年来，一些学者对于战时全国训育与学潮有了进一步研究。刘惠璇所著《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训育问题之研究》，全面剖析了战时大学训育及学潮问题，视野宏阔，是目前学界讨论战时训导制的一项重要研究。^{〔2〕}张均兵讨论了国民政府时期的大学训育问题，但将训育分为“显性”与“隐性”，并将导师制、党团组织均列为“隐性训育”。^{〔3〕}田海洋则从教育学的视角，考察了民国时期的训育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实践。^{〔4〕}廖风德的《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强调学潮对战后国共两党势力的消长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5〕}胡苏珊(Suzanne Pepper)在《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辟出专章剖析知识阶层对国共两党的态度及批评。^{〔6〕}胡国台讨论了战时国共两党在大学校园展开的斗争，时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朱家骅试图拓展学校的党部组织，但遭到共产党的抗衡。^{〔7〕}黄坚立则详考了国民党对于学生政治

〔1〕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版；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John Israel(易社强)：《Student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7-1937》，Stand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2〕 刘惠璇：《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训育问题之研究》，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1997年。

〔3〕 张均兵：《国民政府大学训育（1927—1949）》，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4〕 田海洋：《道德之维：民国时期训育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 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

〔6〕 胡苏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王海良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7〕 Kuo-tai Hu,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on Campus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1937-45," *China Quarterly*, No. 118(June 1989).

运动的政策,并分析其挫败的原因。〔1〕 汪朝光细考战后国共政争的过程,揭示国共两党政争的社会背景以及对中国政治走向的影响。〔2〕 这类研究多从宏观视角入手,对于把握全局或有所裨益,但细致的个案研究尚较匮乏,训导制究竟在大学校园内发挥了何种作用,产生了何种效果,带来了何种影响,仍不甚明了。

第二,西南联大及其他大学研究。战时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强强联手组成的西南联大,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据特殊地位。有鉴于此,西南联大已然成为学界研究热点。易社强(John Israel)著《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一书,述及国民党对联大的控制及联大的反控制,是目前所见较为详尽的一部西南联大校史。〔3〕 闻黎明较早展开了对于西南联大教授群体的研究,并且关注自由主义教授群与学生运动之间的关系。〔4〕 杨奎松在对昆明学潮的研究中,关注西南联大不同政治立场教授的分合与转化。〔5〕 王晴佳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对教授与学潮的关系作了探讨。〔6〕 王奇生亦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对国民党在大学校园中的组织形态及具体活动作了细考。〔7〕 这些研究

〔1〕 黄坚立:《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2〕 汪朝光:《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3〕 易社强:《西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中国大学》,饶佳荣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

〔4〕 闻黎明:《论抗日战争时期教授群体转变的几个因素——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为例的个案研究》,《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5期;《论一二·九运动中的大学教授与联大教授会——中国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考察之一》,《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

〔5〕 杨奎松:《国民党人在处置昆明学潮问题上的分歧》,《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

〔6〕 王晴佳:《学潮与教授:抗战前后政治与学术互动的一个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4期。

〔7〕 王奇生:《战时大学校园中的国民党:以西南联大为中心》,《历史研究》2006年第4期。

视角独特，立论深入严谨。除了西南联大之外，有关其他大学政治文化的多项研究亦值得关注。叶文心对于 1919—1937 年中国大学不同的文化风格和政治取向着墨较多。^{〔1〕} 王东杰对于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的研究，展示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国家与大学关系等复杂面向。^{〔2〕} 许小青的研究则将中央大学纳入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迁中进行探讨。^{〔3〕} 蒋宝麟以 1927—1949 年中央大学为个案，考察该校的教育体制、学术研究和校园政治文化等问题，从中折射出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复杂关系。^{〔4〕}

第三，战时及战后党派政治研究。相较于各民主党派，执政党国民党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一直是学界的研究焦点。王奇生以国民党“治党史”为中心，详考国民党党机器的运行机制和组织形态，并探讨这一运行机制对于中国政局的演变产生的影响。^{〔5〕} 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被认为是执政党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郭绪印在其具有滥觞意义的研究中就指出“国民党内的派别矛盾是始终存在的，派别斗争是无休止的”。^{〔6〕} 周维朋对于 1940 年代国民党内革新运动的分析，借由“革新运动”与“派系政治”两项交互影响的因素中，探讨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7〕} 金以林关于政学系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政学系

〔1〕 叶文心：《民国时期的大学生校园文化（1919—1937）》，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

〔2〕 王东杰：《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3〕 许小青：《政局与学府：从东南大学到中央大学（1919—193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年版。

〔4〕 蒋宝麟：《民国时期中央大学的学术与政治（1927—1949）》，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5〕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华文出版社 2010 年版。

〔6〕 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7〕 周维朋：《战后中国国民党派系关系之研究：以党政革新运动为中心的探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3 年版。

不仅满足了蒋介石政权建设的需要,也改变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权力结构”。〔1〕林绮慧以朱家骅为中心,探讨学人从政办党所引发的派系冲突及其与蒋介石的关系。〔2〕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于1938年,它的主要发展目标就是大中学校的学生。樊中原考察了战时三青团在大专院校开展的各项活动。〔3〕王良卿对于三青团与国民党的关系作了更加全面详实的究察。〔4〕贾维较早对三青团成立及其与国民党的关系作了剖析,〔5〕最新的研究成果则对三青团历史做了完整论述。〔6〕

第四,战时学人介入政治研究。在这一时期,自由派知识人引发的关注较为彰著。陈仪深根据“个人与权力中心的距离”,把1940年代的自由主义分成“个人谏诤”、“组党介入”、“公共论坛”等三种类型,分别以胡适、张君勱、储安平代表之。〔7〕在对储安平及其《观察》群体所作的个案研究中,汪荣祖也认为,“储安平英勇的奋争却以个人的灾难而告终。在革命的中国,这或许就是自由主义悲惨命运的缩影。”〔8〕胡素珊对1940年代后期内战中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抉择着

〔1〕金以林:《蒋介石与政学系》,《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金以林的另一项研究,则主要围绕蒋介石如何在国民党内取得“最高领袖”的过程,以及他同国民党派系之间的纠葛与斗争。参见氏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2〕林绮慧:《学者办党:朱家骅与中国国民党》,台湾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3〕樊中原:《抗战时期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大专院校之研究》,台湾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硕士论文,1986年。

〔4〕王良卿:《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关系研究(1938—1949)》,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

〔5〕贾维:《三青团的成立与中共的对策》,《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2期;《三青团的结束与党团合并》,《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国民党与三青团的关系及其矛盾之由来》,《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4期。

〔6〕贾维:《三民主义青年团史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7〕陈仪深:《国共斗争下的自由主义(1941—1949)》,《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下),1994年6月。

〔8〕Young-tsu Wong, “The Fate of Liberalism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hu Anping and His Circle, 1946—1950,” *Modern China*, Vol. 19, No. 4 (Oct., 1993).

墨较多。^{〔1〕}此外，立场左倾的学者也引起研究者的关注。马紫梅（Mary G. Mazur）在关于吴晗的一项研究中，^{〔2〕}即以吴晗 1940 年代在统一战线及民主同盟的活动为主线，目的在于追寻促使吴氏参加政治活动并反对国民党的原因，并探究其政治行为的本质。最近，与执政当局关系较为密切的学者也开始受到关注。黄克武以西南联大教授贺麟与蒋介石的关系为主轴，探讨蒋介石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交往，并试图了解此类交往关系如何影响知识分子面对 1949 年离开或留居大陆的抉择。^{〔3〕}这些研究关注具体人物的历史命运，角度值得借鉴。

第五，浙江大学研究。主要有谢世俊著《竺可桢传》^{〔4〕}、毛正棠著《竺可桢校长主持浙大校政十三年》^{〔5〕}、张彬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6〕}等。这类研究对于竺可桢的一生及主政浙大时期作了全景式的描述。傅国涌主要利用《竺可桢日记》等资料，对于竺可桢的校长生涯做了“同情之了解”的论述。^{〔7〕}陈红民、段智峰通过解读竺可桢与朱家骅的往来函件，呈现出竺可桢主政浙大时期的困境。^{〔8〕}有学者

〔1〕 Suzanne Pepper, "Socialism, Democracy, and Chinese Communism: A Problem of Choice for the Intelligentsia, 1945 - 49," In Chalmers Johnson ed.,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eattle &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3.

〔2〕 Mary G. Mazur, "Intellectual Activism in China during the 1940s: Wu Han in the United Front and the Democratic League," *China Quarterly*, No.133 (Mar., 1993).

〔3〕 黄克武：《蒋介石与贺麟》，《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67 期，2010 年 3 月。

〔4〕 谢世俊：《竺可桢传》，重庆出版社 1993 年版。

〔5〕 毛正棠：《竺可桢校长主持浙大校政十三年》，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6〕 张彬：《倡言求是 培育英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7〕 傅国涌：《竺可桢——校长生涯十三年》，《书屋》2006 年第 2 期。

〔8〕 陈红民、段智峰：《抗战期间竺可桢主持浙大的一个侧面：解读竺可桢与朱家骅的几封往来函件》，《晋阳学刊》2010 年第 5 期。

进而指出,大陆地区在近十年来有关抗战时期文化史研究中仍太过偏重中共部分,尤其是对彼时中国文人的研究上,“被锁定的对象大部分是所谓‘进步’的知识分子,即立场‘倾共’者。”〔1〕然而,新近的几项研究已开始彰显与此不同的视角,论者更多地关注国民党与知识界的亲疏关系,像张其昀这样与国民党走得较近的学人也引发较多关注。〔2〕浙大史地学系的组建与存废,是民国学科史上较为特殊而重要的事件,已有研究从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探究浙大史地学系的办学特色。〔3〕史地学系是浙大学人自主规划学科建设的有益实践,意义颇为重大。

二 研究思路与主要内容

从训导制在国立浙江大学的实施,到党团体系在大学的确立,进而到国民党党化教育在大陆的最终溃崩,这期间充满了政党派系、学人以及学生为争夺权力及政治合法性所展开的角逐。如何从浙江大学这一个案中剖析此三者的角色与影响,展示其相互关系所呈现出的变化,并借由学人的政治认同反观民国政治文化的转变,乃本项研究的主要议题。鉴于学术界研究的阙漏,本书立足于政治制度史、社会

〔1〕 冯启宏:《战争与文化:近十年抗战时期文化史的研究回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3期,2006年9月。

〔2〕 王永太:《凤鸣华冈:张其昀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钱茂伟:《现代浙东学人张其昀的史地学成就》,《浙东文化研究集刊》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许小青:《张其昀与南高学派》,《近代史学刊》第7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瑞:《“圣人之徒”的儒生情怀:以探析张其昀学术思想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戴清:《张其昀与民国时期的史地教育(1919—1949)》,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郑素燕:《继承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记张其昀的生平及其言论》,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3〕 颜士之、许为民:《张其昀史地结合思想与浙江大学史地系办学特色》,《浙江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